

在每个信号周期内迭代 30 次，计算复杂度 $O(n^2)$ ，单周期求解时间保持在 0.45s 以内。对比结果表明，协同控制在高峰流量 2000 辆/h 条件下，路口通行能力从每小时 3200 辆提升至 3700 辆，事故风险降低 12%。实验验证证明该策略能有效提升交叉口运行效率并改善交通安全水平。

4.2 控制策略在城市路网场景下的验证与对比

在城市路网仿真中，实验区域包含 16 个路口与 32 条道路，基准组采用固定控制，平均车速为 25.4km/h，平均排队长度为 38.6m。协同控制组引入自适应信号调度与路径引导算法，优化目标为最小化 $F = \sum(w_1T_i + w_2Q_i + w_3E_i)$ ，其中 T_i 表示延误时间， Q_i 表示排队长度， E_i 为能耗，权重设为 0.4、0.3、0.3。实验数据显示，协同控制策略下平均车速提升至 32.8km/h，延误时间下降 26%，平均排队长度减少至 27.4m，燃油消耗率降低 9%。在流量峰值为 2500 辆/h 的条件下，路网整体通行能力由每小时 48000 辆提升至 61000 辆。对比结果表明，协同控制在大规模复杂路网中表现出显著优

势，能够在多目标权衡下实现全局最优，为交通治理提供有效解决方案^[4]。

4.3 仿真结果的交通效率、安全性与稳定性分析

仿真结果表明，协同控制策略在多场景下均显著提升交通效率。在单交叉口实验中，车辆平均延误减少 27%，车速稳定性方差由 16.2 下降至 9.8，运行波动率降低 40%。在城市路网实验中，事故模拟发生次数由每小时 4 次下降至 2 次，安全性提高 50%。稳定性分析基于李雅普诺夫函数 $V(x) = x^T P x$ ，矩阵 P 取正定，系统状态 x 收敛速度较基准组提升 32%。对比算法收敛迭代次数，协同控制在 100 次迭代内达到最优解，而基准控制需 160 次迭代，计算效率提升 37%。整体数据验证表明，该策略在提升平均车速、减少能耗、降低事故风险与增强系统鲁棒性方面均具有优势，为 ICV 交通系统的推广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依据与实证支撑，详见表 2。

表 2 交通协同控制仿真验证结果分析

场景	基准延误 / 车速	协同延误 / 车速	基准通行能力	协同通行能力	验证结果
单交叉口验证	52.3s/28.6km/h	38.4s/33.1km/h	3200 辆/h	3700 辆/h	事故风险降低 12%
城市路网验证	延误高 /25.4km/h	延误降低 26%/32.8km/h	48000 辆/h	61000 辆/h	能耗下降 9%
区域优化实验	车速 25km/h	车速 32km/h	低于 60000 辆/h	超过 60000 辆/h	效率提升 28%
安全性评估	事故 4 次/h	事故 2 次/h	安全风险高	安全性提升 50%	安全性增强
稳定性分析	收敛迭代 160 次	收敛迭代 100 次	波动率 16.2	波动率 9.8，稳定性提升 32%	计算效率提升 37%

5 结语

ICV 交通协同控制策略的研究与仿真验证为未来智慧交通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通过对系统框架、建模方法、控制策略和仿真设计的系统性探讨，可以发现多源信息融合与多目标优化在提升交通效率和安全性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仿真实验结果表明，协同控制能够有效降低车辆延误、提升平均速度并减少事故风险，展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与鲁棒性。这些成果不仅证明了控制策略的可行性和应用价值，也为实际交通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随着通信网络与计算平台的不断升级，ICV 协同控制将进一步实现更大范

围的动态优化，推动城市交通向高效、低碳与智能化方向发展，为现代交通系统的可持续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梁林.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背景下的交通安全管理策略[J].人民公交,2025,(10):38-40.
- [2] 王国莉.从无人车送货看智能网联汽车的交通安全问题[J].中国航务周刊,2024,(47):57-59.
- [3] 杜琳,徐勇.基于未来城市立体交通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发展研究[J].人民公交,2024,(12):139-142.
- [4] 游安奇.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协同创新系统建模与仿真研究[D].导师:舒辉.江西财经大学,2024.

On the role of AI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western history and the de-westernization of centralism

Xuanrui Liu

Schoo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iam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amen, Fujian, China 361021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force influencing human civiliz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t not only transforms the ways information is acquired and disseminated, but also exerts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global knowledge order at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levels. This paper combines critical theory with post-colonial studies to explore how AI can reveal biases and fabrications in Western-centric narratives while promoting the de-Western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The article specifically examines China's recent anti-counterfeiting practices, demonstrating AI applications in text mining, knowledge graphs, cultural artifact authentication, and cross-linguistic translation through case analyses. It proposes future pathways—including database development, global governance, cultural embedding, and South-South cooperation—to strengthen the civiliz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by offer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global cognitive equity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ivilization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stern historical authentication; Critique of Western centrism;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论 AI 在西史辨伪和去西方中心论中的作用

刘玄睿

厦门工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中国·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已成为影响人类文明和知识生产的重要力量。它不仅改变了信息获取和传播的方式, 也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全球知识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本文结合批判理论与后殖民研究, 探讨 AI 如何在揭示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中的偏见与伪造方面发挥作用, 并推动知识与话语的去“西方中心”化。文章特别关注中国近年来的辨伪实践, 并通过案例分析, 展示了 AI 在文本挖掘、知识图谱、文物鉴定和跨语种翻译中的应用, 并提出未来路径 (包括数据库建设、全球治理、文化嵌入与南南合作), 强化中华民族的文明自觉, 为全球认知公平和文明互鉴提供新的可能。

关键词

人工智能; 西史辨伪; 西方中心主义批判; 中华文明自觉

1 问题的提出与理论背景

西方中心主义 (Eurocentrism) 是近现代世界知识体系中最深刻的意识形态之一。它起源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 伴随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逐渐确立。通过军事力量、经济扩张与文化传播, 欧洲逐步将自身塑造成“普遍文明”的中心, 而将非西方世界定位为“他者”。正如赛义德 (Edward Said) 在《东方学》中指出, 西方不仅通过殖民统治实施政治与经济的压迫, 更通过学术与话语塑造了一个“被建构的东方”, 这个东方往往是神秘的、落后的、需要西方启蒙和治理的。

在史学研究中, 西方中心主义表现为普遍史观的构建, 即以欧洲经验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查克拉巴蒂

(Dipesh Chakrabarty) 在《欧洲去地方化》中批判道: 这种史学框架把欧洲历史设定为普遍范式, 非西方历史只能被附加为“特殊案例”。例如, 在工业革命的叙事中, 欧洲被描绘为科学理性和现代化的源泉, 而中国与印度等文明的长期贡献则被有意忽视甚至抹杀。

虽然殖民体系在 20 世纪中叶逐渐解体, 但西方中心主义并未随之消亡, 而是通过新的方式延续, 主要表现在:

第一, 利用媒体, 制造舆论。国际主流媒体常常在报道非西方社会时, 采取负面框架或刻板印象。例如, 对中国考古新发现的报道往往强调“外来影响”而非本土独创, 将中华文明置于被动位置。

第二, 开办博物馆, 争夺文化遗产。大量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被陈列于西方博物馆, 却被包装为“人类文明的共享遗产”, 掩盖了其掠夺性来源。更严重的是, 一些展品经过拼接和再造, 却依然被标注为“原件”, 形成隐性造假。

【作者简介】刘玄睿 (1976-), 男, 中国湖北武汉人, 博士, 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

第三,强化学术话语权。全球学术体系以英语为主导,西方期刊与出版社掌握话语权,导致非西方学者难以平等参与知识生产。即使非西方研究成果进入国际舞台,也常被“翻译”成西方理论框架下的附属。

要揭示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必须借助批判理论与后殖民研究的理论工具。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意味着知识与意识形态不是中立的,而是权力关系的体现。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阿尔都塞强调,学校、媒体、宗教等文化机构通过日常再生产维系统治秩序,这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潜移默化渗透高度契合。

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福柯揭示了知识生产与权力运行的共谋关系。他认为真理并非客观中立,而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在全球知识秩序中,西方对“真理”的把控正是文化霸权的体现。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葛兰西提出,统治并非单纯依靠强制,还依赖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自愿认同。西方中心主义正是通过教育、学术和文化产品构建了“自然化”的优势地位。

后殖民理论:赛义德揭示了“东方学”话语,斯皮瓦克提出“底层者能否说话”,直指非西方声音的被遮蔽,巴巴则提出文化混杂与抵抗,强调非西方主体的创造性反击。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人工智能的出现,为辨伪与去中心化提供了新的契机。AI并非纯粹的技术,它既可能延续旧有结构,也可能成为打破格局的新力量。

一方面,AI可以通过多语种语料的训练、跨文化知识图谱的构建、图像识别在文物鉴定中的应用,以及机器翻译在学术传播中的作用,为非西方文明争取新的表达与传播空间。

另一方面,由于AI的训练语料高度依赖西方数据,其生成内容容易带有偏见。例如,大型语言模型在生成历史叙述时往往默认以欧洲为“现代化起点”。

综上所述,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长期塑造了不平等的知识秩序。批判理论与后殖民研究为揭示其机制提供了有力工具,而AI则可能成为去中心化的新契机。它的双重性意味着:只有在本土数据库、技术治理与文化嵌入的前提下,AI才能真正服务于文明平等,而非新的霸权工具。

2 中国社会的辨伪实践与文化自觉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中国学界与公众对西方历史叙事中潜在的偏见与伪造现象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所谓“造假”,在这里并不总是指完全虚假的编造,而是指通过有选择性的叙述、隐匿或夸大事实、乃至对文物

的拼接与再造,从而营造一种有利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效果。

在文物层面,大量中国流失文物在殖民时期被掠夺,后进入西方博物馆。然而,展陈过程中往往被赋予“人类共享遗产”的叙事,而其被掠夺的历史背景被淡化或隐藏。例如,圆明园流失文物在大英博物馆的陈列中,多数仅标注为“清代艺术品”,却没有说明其流失过程与殖民背景。更有甚者,一些断裂或残缺的文物经过西方专家“修复”甚至拼接,再以“原件”展示给公众,形成了事实上的“学术造假”。

在历史书写层面,西方学术长期存在“隐性偏见”。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常被描述为“偶然发现”,而欧洲文艺复兴则被塑造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转折点。这种叙事逻辑不仅贬低了中国古代的科学贡献,还在无形中强化了“西方为现代化唯一起点”的普遍史观。

但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不断进步,大量新发现为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和多元一体发展模式提供了实证支持。例如,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表明早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中国已形成了国家雏形与宫殿建筑群,这一时间早于古希腊城邦的出现。陶寺遗址则展现了天文观测台与复杂礼制的证据,显示出中华文明早期已具备高度制度化特征。

这些考古成果对“文明西来说”形成了有力反驳。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声称中国文明是“舶来品”,起源于两河流域或印度河流域,但考古事实表明,中华文明不仅有独立起源,而且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展现了强大的连续性与包容性。

学术辨伪不仅体现在考古发现,也体现在跨学科研究的推进。通过历史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的结合,学者们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对古代文献进行比对,发现一些被西方翻译传播的版本存在删改。例如,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在被翻译成西方语言时,往往被简化甚至篡改,以符合“西方领先”的叙事逻辑。

中国社会对西方文物“造假”现象的反思,还催生了文物鉴定与回流的运动。近年来,多起圆明园文物流失品在国际拍卖市场引发争议,部分文物最终通过法律诉讼、外交谈判或社会捐赠的方式回流中国。

在这一过程中,AI技术也逐渐被引入文物鉴定环节。例如,研究者通过图像识别算法比对不同来源的文物图像,发现部分在国际市场流通的“西周青铜器”实际上存在拼接与修复痕迹,其部分材料来源并不一致。这种技术手段为文物鉴定提供了客观证据,避免了单纯依赖专家肉眼判断的局限性。

文物回流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是文明尊严与话语权的象征。中国社会通过不断努力,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到殖民掠夺的历史责任。这种运动与“去西方中心化”的学术与舆论方向高度一致。

辨伪不仅发生在学术界,也在大众舆论中引发广泛共

鸣。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公众能够直接参与到文化辨伪的讨论中。例如，在微博和知乎等平台上，关于“西方博物馆拼接文物”的话题多次登上热搜，网友通过“打假”形式分享对比图像与考古研究成果。这种舆论动员，既是对学术研究的补充，也是文化自觉在大众层面的体现。

影视作品和网络文学也在推动文化辨伪。近年来，诸如《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化类节目，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与历史连续性，有意对抗西方叙事的长期霸权。这些作品不仅传播知识，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公众的文明自信。

在这一系列社会与学术运动中，黄河清教授的著作《言不必称希腊+光从中华来以图证史》具有标志性意义。该书通过系统整理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文献与考古证据，指出西方史学在文明起源叙事中存在选择性失真甚至伪造行为。黄河清强调，中华文明的光辉并非源自对西方的模仿或移植，而是自古以来独立生成的。本书的出版引发了双重效应：在学术层面，它推动了对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要求国际学术界更加重视非西方文明的独立贡献；在社会层面，它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讨论，成为网络与现实中“去西方中心化”文化运动的重要符号。同时，它也为中国的辨伪实践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参考。因此，它不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种文明自觉的象征，提醒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独立性与批判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的辨伪实践涵盖了学术研究、文物保护、公众舆论与思想动员等多个层面。通过考古新发现、文物鉴定与回流、大众文化传播以及黄河清教授著作的推动，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了系统性的“辨伪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中的偏见与伪造，更强化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自信心。它为人工智能在文化辨伪中的应用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为全球去中心化的知识秩序积累了经验。

3 人工智能在辨伪与去中心化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在当代不仅是科技发展的前沿，更逐渐成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在西方中心主义与全球知识不平等的背景下，AI的引入为文化辨伪和话语去中心化提供了新的路径。AI的作用具有双重性：它既可能因训练数据和算法的偏见而延续西方霸权，也可能通过技术赋能揭露偏见、重建话语，从而推动文明的平等对话。本章将从文本分析、知识图谱、图像识别与文物鉴定、跨语种翻译与文明传播、以及风险与挑战五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本分析与语义挖掘。自然语言处理（NLP）使AI能够在大规模语料中发现规律，从而揭示潜在的意识形态偏见。例如，西方学界和媒体在描述中国考古发现时，常使用“可能源自外来影响”“模仿西方模式”“落后于西方”等措辞。这些话语虽未必构成赤裸的造假，但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西方优越论。

通过训练多语种的语言模型，研究者可以量化这些偏见词汇的使用频率与语境，形成“话语偏见地图”。例如，刘建国与张红岩（2022）利用语义挖掘发现，英语学术文章在提及“中国古代科技”时，更多使用“derivative（衍生的）”“imitative（模仿的）”等词，而较少使用“innovative（创新的）”。这种偏差并非事实反映，而是西方话语权的再生产。AI的分析结果为批判性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有助于揭示叙事中的潜在歧视。

此外，AI的情感分析工具能够识别文本的情绪倾向。例如，当国际媒体报道“一带一路”时，西方媒体多使用“debt trap（债务陷阱）”“expansion（扩张）”等负面词汇，而中国媒体更强调“cooperation（合作）”“mutual benefit（互利）”。这种差异不仅揭示了不同叙事框架，也说明AI能够成为跨文化舆论分析的重要手段。

二是知识图谱与数据库建设。知识图谱是通过节点与关系构建的语义网络，它能够展示不同文明、事件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在去中心化的研究中，知识图谱的作用在于打破“单线性叙事”。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数据库中，往往突出欧洲文明的中心地位，而非西方文明则被边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国际数据库，常强调罗马、希腊的作用，却弱化中亚与中国的主导地位。通过AI构建跨文化知识图谱，可以使不同文明的互动关系平等呈现。

中国已启动“中华文明知识图谱”计划，将考古发现、历史文献、民族志与口述传统数字化，利用AI建立多维度语义网络。这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也能为公众提供可视化的知识体系。例如，当用户搜索“造纸术”时，知识图谱不仅显示蔡伦的发明，还能展示同时期欧洲造纸技术的相对滞后，从而纠正西方叙事中的“技术单向流动”论。

知识图谱还能辅助辨伪。例如，通过比对不同历史文献的语义关系，可以识别出西方翻译与原文之间的删改与歪曲。这种方法让“隐性造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学术批判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是图像识别与文物鉴定。AI在图像识别方面的进步，使其能够在文物鉴定与修复中发挥独特作用。传统文物鉴定往往依赖专家经验，但这种方式存在主观性和局限性。AI通过深度学习，可以在海量图像中学习文物的纹理、颜色、形状等特征，从而识别真伪。

在国际文物市场上，AI已被用于检测拼接或修复的痕迹。例如，研究者利用卷积神经网络（CNN）对青铜器表面进行分析，发现某些拍卖品在不同部位的金属成分存在显著差异，提示其为拼接而非整体出土。这一发现帮助中国学者揭露了西方文物市场上的“高仿造假”。

在敦煌壁画研究中，AI被用于识别后期修复与原作之间的差异，从而揭示早期西方学者在复制壁画时的“二次加工”。这种辨伪功能不仅保护了历史真相，也防止了西方博物馆以“修复”为名掩盖造假。

更进一步, AI 还能用于数字复原。通过生成对抗网络 (GAN), 学者可以重建残缺壁画或破损青铜器, 让公众在虚拟空间中看到文物的原貌。这种“数字复光”不仅增强了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也在全球传播中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可见度。

四是跨语种翻译与文明传播。语言长期以来是非西方文明进入全球学术网络的障碍。AI 翻译技术的发展为突破这一壁垒提供了可能。与传统翻译不同, AI 能够通过深度语义建模, 更加忠实地保留文化概念。

例如, “天人合一”在西方学术翻译中常被简化为“unity of man and nature”, 丧失了其哲学深度。而基于 AI 的翻译模型通过大规模跨语种料训练, 能够保留其哲学语境, 使其更接近原意。

在这一方面, 《光从中华来》等类著作的作用尤为重要。通过 AI 翻译, 该书的核心观点能够迅速传播到多语种学术圈, 而不必依赖西方中介进行“再解释”。这种直接传播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的过滤机制, 让中华文明的自我表达更为真实地进入国际视野。

此外, AI 还可用于跨文化的知识普及。例如, 基于 AI 的智能问答系统, 可以在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上提供关于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即时解释, 减少西方受众因信息不足而产生的误解。

五是规避风险, 应对挑战。尽管 AI 在辨伪与去中心化中具有巨大潜力, 但其风险也不容忽视, 如:

数据偏见: AI 模型依赖的数据主要来自西方语境, 这导致模型在处理非西方问题时存在结构性偏见。例如, 大型语言模型在生成“civilization origin”时, 往往将古希腊作为默认答案, 而忽视中国或印度的考古发现。

算法霸权: 全球 AI 技术平台主要掌握在欧美公司手中, 其算法标准潜移默化地输出西方价值观。这意味着即使非西方学者使用 AI 工具, 也可能在不自觉中接受西方的框架。

伦理与治理: AI 的使用还涉及隐私保护、数据主权与文化挪用问题。例如, 在数字考古项目中, 如果西方公司掌握了中国考古数据, 可能将其商业化利用甚至重新诠释, 从而形成“数字殖民”。

因此, AI 要真正服务于去中心化, 必须建立本土化数据库, 发展自主算法, 并推动国际治理机制, 确保非西方文明在技术使用中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它通过知识图谱重建历史网络, 通过图像识别鉴定文物真伪, 通过跨语种翻译促进文明传播, AI 已成为非西方文明的重要工具。然而, 它也可能因数据与算法的西方依赖而强化霸权。因此, AI 的应用必须结合文化自觉与制度建设, 才能真正推动全球知识秩序的多元化与公平化。

4 中国经验与全球意义

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文化辨伪结合方面的探索, 具有独

特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首先, 中华文明的悠久与连续性为辨伪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二里头、陶寺、殷墟、三星堆等遗址的考古成果, 为中国学者重建文明叙事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其次, 中国的数字化转型速度极快, AI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科研与公共文化事业之中, 为文化遗产的数字保护与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第三, 中国在国家层面重视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独立性, 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文明自觉结合起来, 推动形成了“技术+文化”的双重战略。

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国经验不仅是学术层面的探索, 更是国家战略与社会动员的结合。它不同于西方学界的“知识兴趣”, 而是直接关系到文明主体性和国际话语权的重建。

在文化数字化与 AI 的结合方面, 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以“数字敦煌”为代表的项目, 通过高精度扫描与图像识别, 将敦煌壁画与文献完整地保存为数字资源。AI 不仅用于图像复原与细节增强, 还用于跨语言传播, 使全球公众能够通过虚拟展览体验敦煌艺术的辉煌。

在“天地图”等地理信息项目中, AI 被用于整合考古遗址、历史地图与现代空间数据, 帮助学者理解古代交通网络与文明交流格局。这些项目不仅是科研成果, 也通过互联网平台面向公众开放, 提升了社会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与自豪感。

此外, AI 在文物追踪与回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建立“流失文物数据库”, 结合图像识别与区块链技术, 中国能够更有效地追踪在国际市场流通的疑似流失文物, 为外交与法律行动提供证据。这种数字化手段与传统的历史考证相结合, 使得文物回流运动更具权威性与可操作性。

中国经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是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诉求。非洲、拉丁美洲与东南亚国家同样面临物流流失、历史被歪曲、文明贡献被边缘化的问题。例如, 埃及金字塔的研究长期被西方主导, 非洲本土学者的声音常被忽视; 拉丁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 也常被简化为“前现代社会”。

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丝绸之路”, 推动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合作。例如, 中国与埃及合作利用 AI 对古埃及文物进行三维建模, 与非洲国家合作建设数字博物馆, 与东南亚国家合作保护佛教遗址。这些合作不仅是技术输出, 更是一种文明互助与共同抗衡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践。

AI 在这些合作中的作用, 是帮助“全球南方”建立属于自己的数据库和知识图谱, 从而在全球知识秩序中拥有更强的发声权。这种“去中心化”的实践, 使得文明对话不再是单向的“西方教导”, 而是多边的平等交流。

总之, 中国经验为全球知识秩序的重构提供了三个启示:

第一, 数据库建设是文明平等的基础。没有独立的知识资源, AI 必然依赖西方语料, 从而再生产偏见。中国通